

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

黄建国 高跃新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黄建国,高跃新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ISBN 7-101-02154-9

I. 中… II. ①黄… ②高… III. 藏书楼-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IV. G25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7091 号

责任编辑 李解民

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

黄建国 高跃新 主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4¹/₈印张·324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22.00 元

ISBN 7-101-02154-9/Z·249

目 录

浙江藏书家之精神(代序)·····	毛昭晰(1)
中国藏书文化漫论·····	朱新夏(5)
略论中国藏书文化·····	刘尚恒(23)
清代私家藏书的种类·····	谢灼华(32)
中国古代藏书家与古籍版本学·····	曹 之(43)
私人藏书家的刻书活动及其贡献·····	萧东发(58)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若干问题研究·····	徐建华(79)
清宫昭仁殿“天禄琳琅”特藏聚散始末·····	朱赛虹(103)
浙江的刻书与藏书·····	崔富章(117)
江南三阁 文澜独存·····	林祖藻(124)
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	陈东辉(137)
杨氏丰华堂考略·····	刘 蕃(144)
湖州藏书的聚散及其史鉴意义·····	王增清(154)
湖州百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 ····	顾志兴(165)
试论嘉业堂藏书楼的特点·····	黄建国(182)
嘉业堂藏书楼主的一生及其亲属·····	郎忘忧(192)
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	虞浩旭(201)
抱经楼和水北阁的变迁·····	骆兆平(208)

五桂楼考述·····	俞芙蓉(220)
孙诒让与玉海楼藏书·····	杨渭生(226)
试论祁承燾的藏书理论与实践·····	徐 昕(246)
论徐家汇藏书楼的创建及其变迁·····	王世伟(258)
南京图书馆与历代藏书楼·····	徐忆农(271)
常熟私家藏书概论·····	曹培根(281)
宋代大藏书家叶梦得的藏书活动及其对图书事业 的贡献·····	方建新(292)
中国古代书院与藏书楼文化·····	郑 麦(305)
齐鲁私人藏书楼概述·····	沙嘉孙(315)
望海堂藏书文化的基本特色及影响·····	张志强(333)
传统藏书楼及其虚拟再现·····	陆宗城 李超平(343)
藏书楼长期延续之系统论剖析·····	栗 慧(353)
试论中国古代民间借书活动·····	袁 逸(360)
浅论中国藏书楼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价值·····	陈益君(386)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现象的文化背景剖析·····	张列军(395)
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研究成果综述·····	徐 雁(402)
清刘喜海味经书屋编藏的有关朝鲜文献·····	〔韩国〕朴现圭(427)

浙江藏书家之精神(代序)

毛 昭 晰

去年年末,杭州大学历史系举办了一次“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有老一辈图书馆学专家,也有比较年轻的后起之秀。我特别高兴的是在会上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来新夏先生,并拜读了他和其它学者的论文提要。

中国的藏书事业起源很早,据说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有了“藏室”、“册府”等藏书机构,而且出现了私人藏书家。浙江的藏书家,最早的是范平、范蔚祖孙。据《晋书·儒林传》中的范平条记载,范平“吴郡钱塘人”,范氏“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此后浙江藏书家代有人出,据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杨立诚、金步瀛《中国藏书家考略》统计,自晋至清末,浙江藏书家约四百四十余人,藏书楼二百余处。近读《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文,作者范凤书统计古代至近现代的藏书家,共得 4715 人,按籍贯来算,浙江 1062 人,占 22%,排名第一。其次为江苏,967 人,占 20.5%。虽然关于“藏书家”的标准或定义,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但江浙两省是中国历代藏书最盛的地方,而浙江略胜于江苏,这大概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特别是浙江至今还保留了许多过去的藏书楼,如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宁波范氏天一阁,已有四百多年的

历史,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此外还有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余姚梁弄黄氏五桂楼,建于道光年间的海盐蒋氏西涧草堂,建于光绪年间的瑞安孙氏玉海楼,建于民国初年的宁波冯氏伏跗室及湖州南浔的刘氏嘉业堂等等。尽管藏书有聚有散,但这些藏书楼都能完好地保存至今,这在全国各省中是首屈一指的。还有一些藏书楼的遗址如曝书亭、衍芬草堂、古越藏书楼等也都得到了保护和修缮。

浙江著名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并称“江南三阁”。是乾隆帝藏《四库全书》之所。后三阁俱毁于兵燹,藏书亦都散失。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幸有杭人丁申、丁丙兄弟四处奔走,搜罗残帙约九千册。这些书不及原帙的四分之一。丁氏兄弟又按《四库全书》目录遍觅底本,雇书手补抄缺失。其后钱恂、张宗祥又组织人员继续补抄和收罗原本,终于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全帙。已毁之文澜阁建筑,亦于1881年在原址修复。《四库全书》原抄本编纂之时,因清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之需要,凡于统治者讳忌之处,均加篡改。而文澜阁之补抄本则因按照未经篡改之原书补抄,所以从内容来说,比《四库全书》原抄本好得多。经过丁氏兄弟及钱恂、张宗祥先生的努力,目前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皇家藏书了,它灌注了浙江藏书家的许多心血。现在有人制作《四库全书》光盘,我以为最佳的底本应是文澜阁《四库全书》,因为它保留了许多未经篡改的古籍。

浙江历代藏书事业为何如此之盛?保留至今的藏书楼为何如此之多?为什么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在浙江?《四库全书》江南三阁为什么唯有文澜阁保存了下来?这些问题凑在一起,难道是偶然的吗?诚然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是重要的原因,但我总觉得这中间反映了浙江藏书家的一种精神,正因为有这种精神才使得浙江至今仍能保留这么多的藏书楼,才使得阁圯书散的文澜阁《四库全

书》得以恢复旧观。

浙江历代的藏书家,除了洪亮吉所说的“掠贩家”(书贾)之外,大多是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视书如命,“菲饮食,恶衣服。减百俸,买书读”,到处搜罗故书。购书不得则抄书。其中以抄书闻名于世的有朱彝尊、徐时栋、丁丙等等。朱彝尊还因偷抄史馆藏书而被贬,在书与官之间他宁肯要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知孰愚。”充分反映了他的思想。

藏书家收藏书籍很不容易,但藏而能守则更不易。诚如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所说的:“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历代藏书家历尽艰辛搜集的藏书,很可能因天灾人祸或子孙不肖而丧失殆尽,有些藏家的藏书就在自己眼皮底下散去。为此,很多藏书家订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天一阁管理制度之严是众所周知的。天一阁自建阁至1949年,历十三代,薪火相传而不衰,不能说与其严格的管理制度无关。余姚黄澄量的五桂楼也有管理制度,但开放得多,只要想读书的黄氏子孙均可登楼,即使不是黄氏子孙,只要由黄氏子孙陪同亦可登楼读书。但是有一条:“鬻与借人,即为不孝。”不能拿五桂楼的书卖掉或借人。五桂楼自建楼至今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子孙后代不能恪守家训,那么,纵然广蓄书卷,最后也免不了散佚的命运。事实上即使如天一阁、五桂楼那样的著名藏书楼,其藏书亦有聚散之时。其所以能保存至今,是因为子孙都能爱护先人留下来的这一份珍贵遗产。如五桂楼,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进军浙东,梁弄地处冲要,兵荒马乱之际,藏书不免有所散失。但黄澄量的孙子黄联鏢、曾孙黄安澜,重新搜集散失的书籍,又购入善本,经多年的努力,使五桂楼的藏书得以恢复昔日之规模。这靠的不仅仅是祖上的遗制,而是一种精神。

在浙江藏书家中，面对藏书的散失或毁灭，而仍然矢志不移、孜孜以求者，除丁氏兄弟和黄澄量祖孙四代之外，还大有人在。最令人感动是清代浙东藏书家徐时栋。徐时栋广搜博采，积书六万卷，其藏书楼名“烟屿楼”。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徐时栋避居鄞西山中，其书被人窃掠或被无知者作引火纸烧毁。1862年，他重起炉灶，访求散佚，得书约五万卷，藏于城西草堂。孰料突遭火灾，数万卷藏书与城西草堂一起化为灰烬。两次惨重打击下，他仍坚韧不拔，重建水北阁继续收集藏书。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真正令人钦佩。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浙江的藏书楼，才能有今日的面貌。

在“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者要我发言，我就平日所见所闻谈一点看法。历史系系主任杨树标教授及图书馆学专业黄建国教授要我把当时的讲话整理成文，作为这本论文集的序言。但我当时并无讲稿。因为杂务太多，一直没有时间写文章，拖延至今，十分抱歉。又因研讨会研讨的范围是全国的藏书楼，而我当时发言所讲的内容局限于浙江一隅，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有一个题目为好。但我的文章未能把浙江藏书家的精神都表达出来。例如浙江许多藏书家非常重视乡邦文献的搜集，并刊刻成书；浙江的藏书家也十分关心别人藏书楼的保护；浙江藏书家中，方便读书人来自己的藏书楼查阅图书的也不止是范平祖孙和黄澄量；此外可能还有其它的方面。

浙江的藏书家对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仅是书籍，还有可贵的精神。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七日于杭州花园北村

中国藏书文化漫论

来 新 夏

中国的藏书文化伴随着图书的产生而出现,具有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它以逐渐完备的藏书机构为保证,以专门收藏家和研究者所建设与藏书文化有关的多种专学为羽翼,并以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为主要支柱,围绕着藏用关系的演化,不断地润泽着全民族,形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结构之一。虽然,它也不可避免地遭到过若干厄运,但远瞻仍在发展不已的前景,不能不引起人们研究中国藏书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相关问题的兴趣。它对当前全面研究中华文化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

一 藏书文化的基础——书的起源

藏书文化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书,否则一切无从谈起。那么何时才有书?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甲骨、金石文字就是书,甚至在第62届国际图联的公开报道中也采用了这种成说。我认为这是对书的功能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承认甲骨文和金石文字都是将人的思想言行通过文字、图画记录在专用载体上,并保存在一定

的场所,但它们却缺少书的最重要功能。因为正式图书必须具备三项条件:一是用一定符号(文字或图画)所表达的内容;二是有一定形式的专用载体;三是有广泛的移动和传播功能。而最后一项是图书的最重要条件,唯此才能使人类文化得以传播、丰富和发展而形成一种文化现象,甲骨和金石文字恰恰缺少这一重要功能,因此它们只能是档案,而我国图书的最早形态应是简书。

简书的出现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西周至春秋已利用加工过的竹作为专用载体,可惜至今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的简策实物。而战国时期的竹简早在晋朝就有汲冢竹书的发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则有大量竹简和部分木简的发现,于是简书的形制内容大体清楚。特别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千余枚秦文书竹简,证明简书由秦都流传到湖北的事实。简书具备了图书必须能流通的社会功能,确立了简书作为图书起源的不容置疑的地位。简书为藏书文化的开端提供了必需的基础。

“藏书”一词最早似见于《韩非子·喻老》篇,有一名叫王寿的人负书而行,被另一名叫徐冯的人在途中见到,徐冯即问:“智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王寿的藏书量虽然不多,但“藏书”既成为交往用语中的专名词,可见其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二 藏书文化发展的保证——藏书体制

可以这样认为,随着藏书的出现,藏书机构也就出现,并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完备,即使在战乱动荡的时代也并未忽视,因而它形成一套完整的藏书体制。中国的藏书体制大致可分官藏、公藏和私藏三大系统。直至今日似仍未能超越这三者的范围。

官藏在藏书体制中最早出现,在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夏商时期已有类似管理图书的职官;但也不排除这是根据后来官制相比附的可能。不过,到西周中期以来似已有专职管理人员,《左传·昭公十五年》记周襄王对晋大夫籍谈说“女,司典之后也”,乃指籍谈九世祖伯儵掌管晋国典籍并由此得姓而言。这种以所从事的事业为姓氏的事实正反映西周中期已有专司图书的职官,但还不能认为已有官藏机构。真正官藏机构是老子为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藏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的“室”,^①估计就是“藏室”的简称。西汉武帝在经过多次求书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官藏机构,分宫廷的内书和政府的外书。内书分藏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石室、延阁、广内等处;外书则有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之藏。东汉则立七大藏书处,有辟雍、宣明殿、兰台、石室、洪都、东观和仁寿阁等。由于藏书文化的发展,东汉政府在延熹二年(159)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央最高机构——秘书监,正式列入国家职官系列。三国是一个纷争战乱的时代,但魏有秘书、中外三阁,蜀、吴均有东观,都设有固定的职官。这说明藏书文化已成为任何一个政权所必须保存和发扬的一种文化现象。安定繁盛的时代更受到重视,如唐朝除由秘书省统管全面工作外,尚有弘文馆、崇贤馆、司经局、史馆、翰林院、集贤院等藏书和整理藏书的专设机构。宋朝除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与秘阁作为国家中心外,还有国子监、学士院和司天监的藏书,宫廷内府则有龙图阁、太清楼和玉宸殿,藏书文化得到极大的发扬。清代虽未设专门官藏机构,但在内府皇帝休憩办公之处如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薰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都有不同数量的藏书,而乾隆帝为分藏四库全书所建南北七阁,其规模和布点可称官藏机构之最。

公藏指社会教育、宗教机构的藏书,主要是书院藏书。元代书院比较发达,据一种统计共有 227 所,其中杨惟中、姚枢所建太极书院即选取宋代典籍 8000 余卷作为书院藏书。清朝雍正朝之后,书院发展近 2000 所,许多名人提倡书院藏书,如张伯行在福州创建鳌峰书院,即“出家所藏书,充牣其中”。^②阮元在杭州、广州先后创设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即将其所编纂与刊行的各种书籍用来充实这两家书院的藏书。这对推动藏书文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私藏几乎与官藏先后出现,在《韩非子·五蠹》篇中已叙及私藏图书之事。战国时的名学家惠施,“其书五车”,私藏数量已不算少。西汉私藏事迹,史传颇有记载。东汉时私人藏书家亦为数不少,如杜林、班固、蔡邕、华佗等皆富有藏书;藏书量也大增,如蔡邕私藏几近万卷。历代私藏事业一直在发展、丰富,显示出很大的成就,如宋代的晁公武、陈振孙和郑樵等人不仅拥有大量私藏而且还对藏书的理论与实践作出贡献,形成社会上比较明显的文化现象,对推动藏书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直至清代,不仅学者大多家富藏书,而且某些富商巨贾亦多以藏书来标榜自身的文化气质,其覆盖所及,几遍全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私藏蔚然成风,藏书文化趋于鼎盛。

中国以官藏、公藏和私藏的三大渠道汇聚了古往今来的文化精萃,形成一套完整的藏书体系,为藏书文化构筑了必不可缺的实体间架,并发挥其应有的保证作用。

三 藏书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则是“仁人爱物”。所谓“仁人”便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

所藏尽量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从官藏来看,早在老子主管周藏室时,便曾热情地接待孔子来查阅百二十国史记,彼此还进行了学术研讨。魏晋时期,国家藏书还曾应读者的借阅要求而赠书,如西晋皇甫谧向晋武帝借书,武帝应求赠书一车。唐宋各代也将官藏作部分开放,如北宋的官藏即向一些官员开放,如因工作需要还可经过一定手续外借。清代尤注重官藏利用问题,在四库全书纂修以前,多位学者就有机会抄录官藏《永乐大典》所收各书,有一些重要而散佚的著作得到抢救,学者全祖望、徐松等都做过抄录工作,而《宋会要辑稿》之类的重要典籍因此得以流传。《永乐大典》还被《四库全书》作为采录佚书的来源之一,使古代文化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四库全书》修成后,不仅北京文渊阁可有条件地备人参阅,更在南北要地分建六阁,以便各地士人就近抄用,嘉惠士林,保存和普及文化,所尽仁人之心,功不可没。公藏如书院之藏书本以供士子阅读为主旨,自不待言。至私藏之体现仁人之心更为显著。东汉末年学者蔡邕私藏近万卷,当他发现王粲是一位文采斐然的好学之士,虽然其女蔡琰也颇有学识,但他还是要将藏书数千卷赠予王粲以作育人才。^③宋晁公武之所以能写出一部私家目录名著——《郡斋读书志》,也是得力于他得到四川转运使井度的慷慨赠书五十篋,使晁公武合个人私藏去重后得 24500 余卷,乃录诸书要旨而成书,体现了藏书文化的仁人效果。藏书文化的仁人精神不只局限于汉民族圈,也润泽着周边各民族,并循着文化同化律的趋势发展。辽、金、夏各族以民族文字大量翻译汉籍,与当时各民族的政治民生密切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元 1190 年由西夏编成的《蕃汉合时掌中珠》,是汉夏、夏汉的对译字典,在夏字旁注汉字读音与汉字释义,汉字旁注夏字对音和译语,两两对照,极便检阅,对沟通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会起了重要作用。元朝也很注重提倡藏

书文化,译书有《通鉴》、《九经》、《贞观政要》等等。其文种之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已超越前代。尤其是设立秘书监的分监,颇类似图书馆的分馆,也可视作一种流动图书馆。分监原是随着皇帝去上都避暑时带一些备参阅的政书和类书,但因年年如此,也便形成固定的制度。运书既有苇席、柳箱的包装,又有专人押送,并可经过严格的手续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这是前此所没有的措施。^④

有些藏书家为了发扬藏书文化的仁人精神,亲自为人办理藏书借阅,如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辞”。^⑤有些人如晋范蔚藏书 7000 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他不仅提供阅读,还为读者“置办衣食”。^⑥明清两代不少藏书家逐渐树立外借流通的观念,如明末藏书家李如一就持“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观念,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贻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⑦杨循吉的《题书厨诗》更直抒“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的慷慨气度。许多藏书家都把借阅抄录作为丰富知识、扩大藏书的一种方法,如世学堂纽氏、澹生堂祁氏、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天一阁范氏等大藏书楼都曾接待著名学者黄宗羲进楼抄书。黄氏也不忘所本,真诚地名其藏书处为“钞书堂”以志来源。黄氏之成为清初大学者未始不得力于此。藏书文化为之大放异彩。

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图书的爱护上。从汉代开始,就用竹制小箱(篋)将图书分类置放,以免损失破坏。东汉发明造纸术后,使藏书保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用槱将纸染黄后再用以防蠹。^⑧魏晋时代有一个名叫曹曾的人,家多藏书,他为此修了一个石窟以藏书,称为曹氏书仓。隋朝是藏书文化趋于高潮的时期,炀帝虽是后世所非议的人物,但他爱护图书的心极强而为史籍所称道,如《旧唐书·经籍志》即盛称:“炀帝好学,喜聚异书,而隋

世简编最为博洽。”甚至博学如宋人郑樵也在其所著《图谱略》中极称“隋家藏书富于古今”。它不仅注意典藏,还对图书的形制爱护备至,曾精选其正御本书写五十副本,分上中下三品,用不同颜色的卷轴分藏书室,并建立起能自动启合的门窗和书橱等设施。唐承隋风,私藏图书超出万卷者已不在少数,而爱惜图书者更非个别。如李泌藏书三万余卷,对经史子集分别标红绿白三色以区别藏书质量。宋代除注重图书形制外表的保护改进外,还对图书的内容进行纠谬正误的校勘工作,由崇文院总管秘阁和内府藏书的整理和校勘,并规定每日日课数量,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如曾巩、苏颂、黄伯思等都对校订官藏有所贡献,为后世留下重要的经验。学者对个人私藏尤加用心,宋敏求家多善本,颇着意于校书,更利用这些珍本文献著书立说,成为一代著名学者。尤袤著《遂初堂书目》著录图籍的各种版本,开版本学研究之先河。明代范钦精心营建的宁波天一阁,是至今巍然独存四百多年的古代图书馆,在它二百年后的清乾隆帝为《四库全书》建阁存书时,犹命地方督抚绘制天一阁图纸作建阁依据。它不仅拥有七万余册的藏书量,被誉为藏书天下第一家,而且对爱护图书作了多方面的设想,如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等措施,更是蜚声海内外,为世人所称道,充分体现了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其他许多藏书家也多注重图书的装订、刊印和收藏,可见藏书文化精神的普及程度。尤其是对古善珍稀的典籍更视若拱璧,不惜巨资大量地精工传抄,因而有吴抄、文抄、王抄、姚抄、祁抄、谢抄和毛抄等著名抄家,特别是毛抄更是驰名遐迩,后世所谓毛边纸之称就是毛氏抄书的专用纸张。这种一时成风的抄书活动的文化现象,极大地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应给以充分的研究。清初以来,藏书文化有显然的长足发展,不仅官藏、公藏注重搜求典藏,还由政府组织了工程浩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有选

择地概括了古代、中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将抄本分置在自东北至东南的繁盛之地。私藏尤为普遍,几乎是学者无不藏书,藏者无不是学者,区别仅在于数量之多寡。藏书文化的意识已牢牢地树立,藏书文化的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扬。不少学者为了丰富所藏,不惜移居书市附近,以便捷足先登搜求到佳本善刻,当时声名卓越的学者如王士禛、罗聘、孙星衍和黄丕烈等都在京师旧书集中地附近居住,这无异是推波助澜地使慈仁寺、琉璃厂先后成为最大的藏书文化的中心而历久不衰。学者们在这里交流藏书,传播文化,培育人才,研讨学问,从各方面研究图书,于是版本、校勘、目录和辑佚等专学相继出现,逐渐完善,成为清学的主要部分。不仅如此,若干富商巨贾也被藏书文化的洪流卷进去了。他们毫不吝啬地藏书刻书,养士编书,对藏书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全社会能从仁人爱物的角度来重视藏书文化而把藏书文化推向了鼎盛。

以仁人爱物为中心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素质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板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观念逐渐淡漠,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接近消失,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严重的反文化现象,非常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来提倡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

四 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

中国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就是围绕着“藏”与“用”的问题而展开的。从整个中国藏书史的发展过程看,“藏”似乎是重要支点,而“用”往往处于一种次要地位,所以“藏书”的概念比较早地形成。藏书一词,千百年来未能动摇。为了藏好书,在单篇传写的时代,首先

要收集零散的书加以整理与编纂,孔子是有确实姓名记载的最早的整理与编撰图书的人。他“修旧起废”,将历代遗留下来的档案、文献,整理和编订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大类,为藏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整理古诗三千余篇时,提出了有关藏书文化的最早理论原则,即“去其重”和“可施于礼义”者,按现代话解释,前者是运作标准,后者则是政治标准,二者成为藏书的基本依据。他把诗先按性质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下又按地域分为十五小类,这是藏书二级分类的雏形。他把六艺作为选择藏书标准,所以司马迁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孔子这些片段理论虽不够完整,但却为以藏为主的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而其影响及于后来。荀况在《王制》中说“以类行杂”和《正名》中所说“同则同之,异则异之”,都为藏书分类提出了指导性原则,为藏书文化的发展和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用”对藏书的作用也被学者正式提出,韩非在《三难》篇中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于百姓者也”,又在《五蠹》篇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商鞅在所写《君臣》篇中说“诗书与则民学问”。后来汉武帝为实现其大一统而不断用兵的需要,特命专人从积如丘山的简书中去整理兵书、编制《兵录》等。这些言论和活动都说明藏用的开始结合。

这样就形成了以藏为主、藏用结合的藏书文化基本理论。在近代以前,这一基本理论一直指导着历代的图书事业,特别是藏书活动,甚至近代以来尚在争论着藏与用的关系问题。这一基本理论既对藏书文化的延续发展有保证作用,但也局限了藏书文化的发展速度和涵盖面。

在以藏为主的理论指导下,加以历史上的兴衰治乱的不断交